

N 本期聚焦

供给侧改革不是新的“计划经济”

邱海峰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与“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相关的宏观调控措施正不断增多，一部分人开始认为这是经济运行计划性在增强、市场地位有所削弱，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新一轮的“计划经济”。对此，专家指出，供给侧改革与“计划经济”的主体完全不同，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应该认识到，供给侧改革既不会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会走放任不管的“歪路”，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者有着本质区别

说供给侧改革就是新的“计划经济”，完全是忽略了二者的主体性差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表示，计划经济是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安排经济活动的，仅仅从表面上看，供给侧改革与其有一些相似，但二者的本质是截然不同的。计划经济的主体是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山西省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李晋中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发展经济的主体，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管理，政府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对企业实行国有国营、对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用计划经济手段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经济建设。同时政府又承担着公共产品的提供，如教育、文化、科技、医

疗、社会保障、就业、职工住房等。万博研究院院长滕泰也指出，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供给侧改革不是新的“计划经济”。对于供给侧改革应避免炒概念，避免将其理解为新的“计划经济”，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供给侧改革。

依靠市场优化配置

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供给侧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供给侧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再依靠行政配置的手段。中央文献研究员高长武表示，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已经带来不少要素配置扭曲，比如，企业竞争机制方面，那些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状态的“僵尸企业”，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而勉力维持，占用和浪费资源配置；流通体制方面，由于各行业、各地区设置的条条框框过多，导致运输效率低下、物流成本高企，推高了商品的价格。

通过供给侧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利用市场提高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是当前的最佳选择。万博研究院理事长宋宁指出，供给侧改革着力于激发市场主体的自身活力，使各类要素能够便利地进出市场，自由地创造价值，自主地实现价值，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

仍需适度宏观调控

需要指出的是，供给侧改革既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也不走放任不管的“歪路”。高长武认为，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端，会



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强调，在供给侧改革中政府不能缺位，政府要为供给侧改革创造一个好的经济环境，这个经济环境包括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要鼓励企业公平竞争，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进入一些有行政障碍的领域排除障碍。还有一些领域虽然没有明显的行政限制，但企业在进入过程当中还有一些隐性障碍，这些也要排除。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指出，供给侧改革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化追赶到超。“守正”要求我们必须尊重顺

应市场，政府起辅助性作用，但这个作用要更好地发挥出来不是我们简单用市场经济体的已有经验和简单的延续。在供给侧改革中，那些我们过去已有的需求管理经验，必须通过成功的创新，即“出奇”，才能在面对一系列改革艰巨任务时有所作为。

此外，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力量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克用认为，在养老保障、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领域，政府常常难以直接提供高效的产品和服务。而由于这些领域的公益属性，也缺乏市场激励，所以，社会力量更应得到重视。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N 学者观察

历史学者有责任纠正被贬低的中国古代文明

李学勤

事实上，我们走哪条路常常不是由你个人决定的，而是由一些必然的和偶然的外部事件构成。尽管如此，一个人必须要有一种自觉，不能随波逐流，不能没有自己的意志和要求。

如何有自觉的意识和要求呢？了解历史非常重要。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的国家，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成为包袱。如果从五千年国家民族的风风雨雨里，找到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得出对当下有用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就可以说人有了自觉。所以自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历史。

我觉得历史可以给每个人一种重要的精神。什么精神呢？前些天有人请我写一个序，谈到梁启超，他最后要编一部《中国通史》。为什么要编这样一部通史，梁启超说是因为爱国。我们说一个人爱国，为什么要爱国？爱国家的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而且在近代以来，在逆境中重新站立起来，走上了崛起的道路。这是了不起的，一定会载入世界史册的。这样来说，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爱国精神的培育是不可分的。

20世纪80年代，我有一次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去南开主楼那就看到很多大纸写的壁报，上面就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历史有没有用。那时我才知道一些人认为历史没有用。后来在演讲或者讲课的时候

候，我常常讲这个话题。如果你是在一个流水线上，很机械地做出一个东西来拿去卖了，那历史可能没有用。可是有没有用，是要看我们国家、民族、时代有没有什么需求，有需求就有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是有用的。

历史从来是割不断的，我们国家当前的现状，是历史造成的。你再想把它分开也分不开。它的现状就是历史的结果，而且现状不断地变为历史。现在我们大家都讲中国梦。这个梦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大家有这样一种心理和希冀，有一种对我们国家民族发展崛起的期待？我们只能说，这个梦本身就是历史形成的，这个梦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要圆这个梦，就必须以历史作参照。

现在外国人很惊讶，为什么中国能做到这些成绩——很多方面中国已经领先于世界。外国人说中国变成一头醒狮了，所以他们不习惯。不习惯可以理解，只要不是恶意的。我们还应该把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发展，我们人民的诉求，我们未来的走向，我们要和平发展，我们希望和世界共同前进的愿望，都告诉世界。

我最早在1980年就提出，重新评价中国古代文明。我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过去因为西方国家的种种偏见，被贬低了。更好地把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说明出来，对那些贬低的中国古代文明加以纠正，这是历史学者的责任。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N 有此一说

真正把失业率看成重要的民生指标

王志平

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对应地，GDP 增长率、物价水平、失业率和国际收支状况，构成了国民经济统计的四大宏观经济指标。在上述四大指标中，失业率指标比其他三个指标在正确反映民生状况和社会稳定影响因素方面，具有更大、更敏感的参考价值。

失业率统计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应有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失业率统计在眼下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实际地位是不尽如人意的。目前在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开的“国家数据”库中，“月度数据”包括“价

格指数”“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等11个类别，没有就业失业数据的位置；“季度数据”包括“国民经济核算”“农业”和“工业”等6个类别，也没有就业失业数据的位置；“年度数据”包括28个类别，其中在“就业人员和工资”类别下另有23个子类别，仅有一个子类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失业率”能简单反映失业率情况。

从某种角度看，政府统计部门没能及时发布丰富的失业率数据，有其难处。目前，登记失业率统计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实施的。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每个月会发布两个月以前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数据”，其中含有就业失业统计数据。然而，数据之

简单，与各方做决策参考的要求相比，确实相距甚远。如2016年3月8日发布的《2016年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数据》，仅在“就业和再就业”类别下包含“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3个数据。说到底，如果不把失业率真正看成重要的民生指标，如果不想让失业率数据有效反映经济社会运行的真实状况，失业率数据是无法获得应有的“统计地位”的。

国民经济统计工作讲“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的因素充分纳入统计体系之中。国民经济统计最忌讳的是“见物不见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就

业是民生之本”。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适时发布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2015年6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有关部门扩大统计范围，进一步完善办法，把调查失业率真正变成权威数据。调查失业率受到了领导的重视，但是调查失业率工作的有关进程，并不尽如人意。事实上，迄今为止，我国政府尚未正式发布调查失业率的数据。可以认为，失业率统计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中一个不该成为短板的短板，必须尽快补上。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来源：文汇报

N 它山之石

德国：“工匠精神”是怎样炼成的

李伦

“中国制造”的印章。英国人认为，“德国制造”就是假冒伪劣、价廉货次；“德国制造”就是刻在德国人额头上的耻辱印记。德意志民族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英国人的抵制和立法以及“德国制造”的耻辱印记，让德国人开始彻底自我反省。从那时开始，大多数德国企业开始把“用质量去竞争”定为首要目标，在设计上大力创新，在质量上严格把关。实现了从假冒伪劣向质优创新的根本转变。

“德国制造”曾是耻辱印记

德国人对“德国制造”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可是谁能想到，一百多年前，“德国制造”曾是假冒伪劣的标志，是刻在德国人额头上的耻辱印记呢？

十八世纪，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科技的排头兵。而此时，德国还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其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与英国相比，相差至少半个世纪。德国人为了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积极向英国学习。但德国人采取的“学习方式”，却让英国人恼怒不已，并采取立法措施，对德国人的“学习”予以痛击。

原来，德国人的“学习方式”就是剽窃技术、假冒伪造。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企业一方面派出工业间谍，通过各种手段窃取英国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派出学徒员工，到英伦半岛进行所谓的“旅游学习”，然后顺手牵羊，把英国的好产品带回德国，进行假冒伪造。当时的德国，工人工资极低，工作时间被资本家无限延长，因而商品成本非常低廉，其价格在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德国人把从英国“偷”来的样品，仿制生产，倾销到英国本土及殖民地。在当时，德国产品就是“价廉货次”的代名词。

此外，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力量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克用认为，在养老保障、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领域，政府常常难以直接提供高效的产品和服务。而由于这些领域的公益属性，也缺乏市场激励，所以，社会力量更应得到重视。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为了以次充好，一些德国企业便盗用他人的品牌标记，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当时，英国谢菲尔德公司生产的剪刀和道具以优质的品质在市场上具有很高的声誉。德国索林根城的刀具剪子制造商便假冒这个品牌，把自己仿制的产品打上“谢菲尔德”的标记出口国外。虽然看上去跟英国产品相似，但德国厂商使用的制作材料是低劣价廉的铸铁，完全不同于英国产品使用的质优价昂的钢。

1887年，英国国会通过《商品法》，勒令所有进入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德国产品必须打上“德

国制造”的印章。英国人认为，“德国制造”就是假冒伪劣、价廉货次；“德国制造”就是刻在德国人额头上的耻辱印记。

德意志民族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英国人的抵制和立法以及“德国制造”的耻辱印记，让德国人开始彻底自我反省。从那时开始，大多数德国企业开始把“用质量去竞争”定为首要目标，在设计上大力创新，在质量上严格把关。实现了从假冒伪劣向质优创新的根本转变。

十年之后，英国人惊讶地发现，德国商品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必不可少，而且质量可靠，价廉物美。曾经假冒英国品牌的德国索林根城的刀具剪子制造商，生产出了著名的德国双立人刀具。今天，这个品牌已行销全球，享誉世界。从1887年到今天，“德国制造”走过了120多年的历程，曾让德国人蒙羞的“德国制造”，如今已变成了让德国人骄傲的金字招牌。

职业教育铸造“工匠精神”

职业教育常被人们视为德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德国之所以盛产具有“工匠精神”的高质量技工，是因为其实行了职业教育和文理教育的双轨制教育体系。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从高中阶段起就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在工厂参加实践锻炼，这是德国工人整体素质提升的重要原因。

与国内“万人争过独木桥”通过高考上大学的现象不同，德国不到一半的中学生选择上大学；而一半多的中学生会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其中不乏大量完全能被大学录取，却依然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中学生。德国的职业教育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德国技师收入可观，其社会地位也与学士相等，同样受人尊重。

选择职业教育的学生交替在学校和企业学习，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在企业进行实践操作。按照德国政府相关规定，德国企业有义务提供职业教育的培训岗位，这使得职业教育体系下的学生能够顺利进入企业或者工厂，跟着有经验的技师学习第一手的应用型知识。德国职业教育的一个基本职业精神就是：一丝不苟、照操作规程办事，而正是这种职业精神使得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严谨、负责态度，为“德国制造”的质量做好了铺垫。据介绍，所有学生必须了解，质量永远摆在第一位。如果学生在培训企业表现欠佳，那就会收到来自企业的警告，并承担相应后果。

观点集粹

多方面因素造成技能人才缺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国强在《文汇报》撰文指出，目前，我国高技能专业人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存在着结构不合理、总量不足等严重问题。

制约我国技能人才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重学历、轻能力；重装备、轻技工；重理论、轻操作；重科技创新人才、轻技能人才”的观念长期存在，形成了对技能才的偏见，使技

能成才对青年和学生吸引力不强，导致技能学习的积极性严重缺乏。

二是职业技能评价进入“重学历”误区。在技能人才评价上，学历、论文、论著仍处于人才评价主体地位，这对于学历偏低或无学历的技工院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是不适合的，严重损害了技能人才的利益，导致技能人才上升空间有限、职业发展通道不畅。三是技能人才在工资定级、落户、流动等方面，都与其他人才有较大差距，存在收入水平偏低、社会地位不高等问题。四是技能人才专项活动实施力度不够。

能成才对青年和学生吸引力不强，导致技能学习的积极性严重缺乏。对于治理主体来说，在网络建设、治理上既要统筹兼顾又要循序渐进。应从基础性建设做起，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网络空间治理要充分重视网络空间特征对公民权利产生的影响，尝试更多积极主动、及时有效的预防性措施，维护好、保障好网络空间中的公民权利。对于网络空间权利主体来说，应当全面、客观地看待国家网络事业的发展和治理的绩效，更加谨慎地恪守权利界限，充分尊重他人权利和公共秩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程晨在《光明日报》刊文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信事业的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获得感”具体到公共治理法治化的语境下，就是如何在网络上更好地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而其前提是准确理解“网络空间公民权利”的内涵外延。

所谓“网络空间公民权利”，是指公民权利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使和实现，并非独立的、不同的权利范畴。因此，公民权利在网络空间行使时要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在享受法定自由和利益的同时，也要遵守法定的界限和规